



問題一：

我想請教有關兩岸金融在上個月有北京經貿論壇，其中也談到了有關兩岸金融的課題，就我們相關資料所得到的，大陸方面在去年的國台辦也明確地表達希望透過春節包機的模式，看是否可以就兩岸金融方面可以有所突破或者參考，可是台灣方面一直沒有明確。第二點，假設大陸方面的金融機構到台灣設立分支機構（比如從代表處）開始，類似於這樣的課題，似乎台灣方面沒有比較明確的答覆，以致於在金融進一步的部分就好像受到一些侷限。而這些問題所牽涉到的方面還不算少，這是我想提的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我們從金融業的角度來看，我認為如果是維持現況下，其實風險是台灣的銀行業在承擔，透過這樣的方式，反而會造成大陸的現代化是我們的產業和金融業扮演一個很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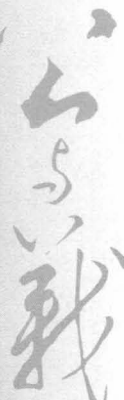
的養分來協助它，而這個跟我們站在比較本土意識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問題是完全相反的觀念。這點要提醒我們在做這樣的決策過程當中，需要思考的一點。第二點，在積極管理的這一部分，我有一個說法，如果要落實積極管理的話，可能讓台灣更多的銀行和金融機構能夠去，在落實這個地方是比較能夠具體落實的，以上謝謝！

薛琦答：

台灣近年經濟實際上沒什麼成長，陳總經理提到，要有經濟成長才會有市場，金融才得以發展。台灣的經濟成長現在都是用real term，物價平減過的，如果不平減的話，我們的經濟成長每年大約要少掉二個百分點，所以用單期價格所計算的經濟成長，實際上真的沒有什麼成長。難怪大家很累，然而又出不去。

華而誠答：

剛才聽到吳主委的報告個人有幾點感想。他提到台灣到大陸投資大概有百分七十，我們在自由貿易談判的國際場合中被大陸封殺，造成台資必須往大陸走，好像是一個統戰的



陰謀。台灣到大陸投資不管其形成原因是什麼，台灣有必要對自己沒信心嗎？國際上所謂的十加一、十加三這麼有效嗎？雖然國際間有自由貿易談判，東亞地區根本搞不清楚怎麼回事，很多 duplication, waste of time，我覺得這些都不重要，台灣還是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台灣過去就是一直欠缺信心所以會比較保守，這樣的保守又是不必要的保守。台灣不是沒有資金、人才，問題在於台灣真的要好好反省反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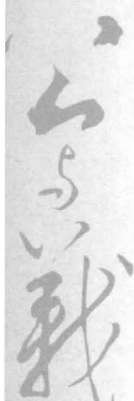
徐小波答：

關於周先生剛才所提到的問題，我也從本土化來給予其另外一個解釋。本土化要如何把台灣做大而不是做小，你是從台灣的本土化的觀念來推，這裡面有幾個數字，剛才麥肯錫的報告指出，台灣有百分之八十的錢在外面，台商對大陸的投資在去年是二千八百億美金，但是經濟部的紀錄上是五百億，所以其中的二千三百億的美金投資很可能是在剛才所講的百分之八十中，但是外電報導說，在海外的資金可能有到一兆美金，但是前金管會主委龔照勝也說了一個五千億美金的數字在一個公開場合。我從另外一種本土意識來看，這

個資源台灣為什麼不好好利用？是不是希望有一天在海外的百分之八十的資金中，如果國內的政策不改變，它在海外買下或者建立一個國外銀行再走進大陸，那台灣不是被邊緣化了嗎？即從這種本土意識來講的話，台灣是輸了，但是我們希望台灣贏，所以這個是一個如果做大台灣不要做小台灣的課題。就從本土意識來講的話，是否我們應該思考將台灣人所創造出來的龐大資金做更好的運用？而不是一種浪費或者是把台灣邊緣化才能去運用它。

吳釗燮答：

大家的關心我都聽到了，也希望在政府內部可以針對大家所提出來、共同關切的這些問題來加以討論，來看看是否可以有讓大家比較滿意的結果。如果以更寬廣的整個社會角度來看，的確台灣在針對兩岸關係的各種方面的不同意見，常常還是很強烈，陸委會不管怎麼做都還是會飽受批評之苦，金融方面當然也是一個很棘手而且非常敏感的項目，很多人認為如果可以讓金融業前往大陸發展，就是把台灣的資金帶給那邊去，需要的資金有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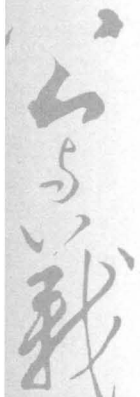


少等等這些聲音我們都聽見了，但是如何讓台灣的金融業更加地自由化，如何讓兩岸之間的金銀往來更加正常化，我想除了陸委會原本一直就在處理的項目外，更重要的應該是我們相關的政府機關應該來進行多一點的討論與合作。

在座有幾位也曾經任職過政府部門應該共同認知到，政府機關裡面要不同的機關來互相合作並不容易，陸委會是一個比較可以做為溝通平台的機構，因為很多的政府機關在陸委會都是我們的當然委員，所以要讓大家感受到好像政府在這一方面有所進展、推動，必須要陸委會負起更多的責任來推動金融自由化或者是兩岸的金銀往來能夠更加制度化的這種措施。

剛才一個問題是，是否可以沿用澳門模式或者春節包機的協商模式來討論到兩岸的金融業務、金融監理機制等這一些，兩岸必須要透過協商才能夠加以解決的這些項目，在這一部分我們都沒有加以排除，到目前為止，澳門協商模式用在春節包機的協商是很成功的，用在目前在推動得更廣泛、趨向常態化的包機，看起來也都順利。將來要用到觀光

客的協商，我想准用方面看起來也沒有問題。所以我覺得澳門協商模式可能是到目前為止能夠讓中國大陸方面覺得沒有問題，也讓台灣覺得我們不會失去我們的立場的一個做法，最主要的還是中國大陸不承認台灣政府，認為只要和台灣的民間協商，但是台灣方面認為，只要涉及到政府公權力一定要政府的參與，澳門的模式中國大陸可以繼續，這是民間的協商，但是對台灣而言，澳門模式就是官員實際去參與協商的項目，所以這個是引用到其它的範圍，但是要看各個不同的項目，其屬性是否能夠找到相關的民間團體來做為代表政府去和對岸做溝通、安排的機構。在過去二年來，我在陸委會最大的感觸是，我們國內的各個政黨之間常常不能夠互相合作，常常是讓我們裹足不前的一個基本原因。尤其是像去年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的相互批判或衝撞，實在讓本來希望推動的兩岸政策變得無法推動，但是我們也從中學得很多的教訓，亦即我們要和反對黨之間有某種程度的溝通和合作。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這一些合作似乎有一定的進展。比如江丙坤副主席常跑中國大陸，有很多項目是他所關心的，最近他關心的一個項目就是兩岸標準化的一個措施，為了



兩岸標準化論壇，他親自跑到我辦公室以及我跑到他辦公室數次，最後安排到中國信息部的副部長能夠到台灣來跟我們的業者、相關官員能夠有機會坐下來談，這個就是政府、執政黨、反對黨能夠積極合作的一個做法。除了這些之外，另外還有很多的項目都是執政黨和反對黨可以合作的，也只有透過執政黨和反對黨能夠積極合作，才能夠讓兩岸關係的推展能夠在一個更有效率而且是更有秩序的一個方向下面來發展，以上簡短的說明，謝謝各位。

林全答：

首先感謝時報文教基金會余董事長提供這樣的一個平台，大家做個溝通，因為在民主政治運作的過程中間，其實我自己也有所感觸，民主政治給每一個人帶來的就是充滿對於公共政策的無力感。我相信如果台灣在金融產業國際化的腳步上能夠做得好，下午所要討論的很多議題也就自然而然的可以做得很好。在這裡還是謝謝各位來賓的參加。